

孔子学院

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研究

周汶霏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孔子学院对山东省对外传播的影响机制研究”  
(19DXWJ02)研究成果

# 孔子学院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研究

周汶霏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子学院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研究/周汶霏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20. 7  
ISBN 978-7-5607-6654-6

I. ①孔… II. ①周… III. ①国际教育—研究  
IV. ①G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41838 号

策划编辑 张晓林  
责任编辑 刘森文  
封面设计 张 荔

---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发行热线 (0531)88363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和平商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14 印张 279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首届全体大会上提出了“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指出其宗旨是理解国际重大问题、尊重联合国和国际关系、消除国际冲突的根源、发展对他国的友好印象。国际理解教育孕育并产生于战争与和平交接的动荡年代,更多地背负了维护世界和平和新秩序、增进文化理解避免冲突的历史使命。由于受到时代背景和政治意识的影响,这个理念在随后的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方式与效果。

伴随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明多样化态势的发展,很多从前看似并无关联的“局部”问题,如今逐渐演变为“全局”问题,有的甚至演化成危机与冲突。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曾经基于战争背景提出的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希望能为人类在当代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启发与指引。但过往的实践经历说明,国际理解教育因其具有超越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宏大教育目标、观照全人类的共同命运、涉及的领域广泛且体系复杂,而始终难以被切实、完整、有效地贯彻实践,即便曾作为专门的课程体系出现在教育场域,但大多也是昙花一现。目前所见更多的是对这一理念的碎片化实践,这很难彰显国际理解教育蕴含的真正价值。

虽然积累至今研究成果众多,但由于国际理解教育的含义界定不明确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长久以来都困扰着这一教育理念的发展。很多学者尝试在原有理念的基础上进行新的阐述,并发展出环境教育、发展教育、国际教育、全球教育、人权教育等教育理念,它们大多是国际理解教育的衍生品,而其影响力和知名度却超越了国际理解教育本身,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同时,因为含义界定不明确,导致国际理解教育在实践的过程中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支撑和评价机制,致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成果流于形式或零散化。因而,对半个多世纪来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生成与实践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并根据新时期的社会特点和时代发展需要,对其内涵进行新的界定与阐发,可以为本书提供两个重要提示:(1)以理论发展规律与实践需求为基础,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进行新的界定,梳理发展历程,挖

掘这一重要理念在当代社会的价值；(2)为现实世界中的教育实践提供可参考的理论范式与经验借鉴。

孔子学院是国际理解教育理念被提出半个世纪之后,发生在新时代的一次令人瞩目的教育实践行动。作为寻求语言与文化理解的国际教育组织,孔子学院的实践与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在很多方面存在契合点,但不同的是,孔子学院的实践更为“落地”和系统化,国际理解教育过往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对孔子学院的发展产生过多干扰;另一方面,孔子学院的发展宗旨与国际理解教育安身立命的理念基础高度吻合,但这一点迄今为止未得到充分强调与彰显。这种错位或许是因为在国际理解教育与孔子学院之间没有建构起一种相互融通的对话空间,也就无法将二者置于同一维度加以审视。本书尝试做这样一种努力,就是通过建构一种对话空间,将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与孔子学院的实践相联结,借助教育学、传播学、管理学等学科理论及工具,分析孔子学院通过语言与文化传播的手段达成实现国际理解、促进世界和平的具体实践路径,同时从国际理解的价值取向出发,为孔子学院的全球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本书以国际理解教育为基本理论依据,参考框架理论、对话理论、文化间性理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交互转化理论、跨国教育组织与全球传播理论等,通过文献分析与案例分析,对孔子学院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进行层层解析,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孔子学院是怎样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这一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新的时代背景下,国际理解教育的学术与社会意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基础与路径是什么?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机制与具体表现是什么?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优势、挑战与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围绕上述问题,本书共分为七个部分:

第1章 孔子学院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研究概述。分别梳理国际理解教育、孔子学院自产生以来的发展脉络、理论研究现状及问题。介绍本书的理论基础、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第2章 国际理解教育的当代界定。首先,通过梳理国际理解教育的历史沿革,指出国际理解教育因缺乏有效实践体系的支撑,而一直难以实现其真正价值。其次,在国际理解教育的语境下分别分析了国际、理解与教育三个构成要素的意义,剖析了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演进过程,指出进入新时期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和使命已经发生了变化,向“全球公民教育”目标的转型是一个重要体现;与此同时,许多类似的教育理念也随之出现,是国际理解教育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形式。再次,介绍了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和社会力量对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历程,分

析实践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反思国际理解教育的局限性。最后,在上述基础上本章尝试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内涵与当代意义进行重新界定,建立本书的逻辑分析框架,即当代的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可实践的教育理念,由“国际”与“理解教育”两个概念维度构成,具有兼容唯一性与多元性的跨文化教育理念、强调整理解与宽容的价值、关注主观能动性、个体差异性、关注教育公平的实现等当代意义。

第3章 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条件。本章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即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基础是什么?实践的具体路径是什么?本章首先从前置性基础与可行性基础两个角度分析了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基础,认为历史与传统因素、自身因素、教育机制因素等构成了前置性基础,理念因素、合作因素、权力因素与技术因素等构成了可行性基础;这些基础决定了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具有现实可能性,但仍需要来自教育、社会网络、文化理解等因素的参与,只有通过依托教育实践、倚重社会网络、寻求文化理解、强调人格魅力等路径,才能真正促成这一实践。

第4章 孔子学院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机制。本章从组织特点、教育理念及教育实践形式三个角度,剖析孔子学院对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机制。第一,在组织特点方面,孔子学院作为教育组织的国际属性决定了在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过程中,孔子学院采取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嵌入式”社会活动模式、国际化人才建设与储备模式、社会资源的国际化配置、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国际化扩张、无国界的数字教育等途径进行实践。第二,在教育理念方面,兼容多元性与差异性、强调自我与他者间的理解与对话、关注功利之外的意义等都是孔子学院与国际理解教育所达成的价值共识,它们共同构成了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价值取向。第三,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特质体现在对“国际”视野下的“理解教育”的诠释上,因而本章以狭义视角上的教育活动为例,分析了孔子学院在语言技能教育实践、文化素养教育实践、师资培养教育实践与研究型人才培养实践等四个方面所体现的理解导向。

第5章 孔子学院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案例分析。本章以孔子学院发展规划的基本原则为切入点,分别从具体教学、运营模式、合作方式和政策规划四个角度选取了孔子学院实践案例作为分析对象,探讨孔子学院对国际理解教育的具体实践过程。第一,本章选取了孔子学院的课程设置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体验基地、网络孔子学院为例,分析孔子学院在具体教学方面强调交际能力的语言教学、文化理解的多样化实现、数字教育的整体性铺设等实践特点。第二,以英国爱丁堡大学孔子学院、日本北陆大学孔子学院、中蒙友好基金会、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师资培训项目等为案例,分析了孔子学院通过国际化组织架构、运营模式及人才体系建设等路径实现运营的实践特点。第三,以“汉语桥”项目、孔子新汉学计划、澳

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等不同层次的案例为对象,分析了孔子学院在教学与研究的中外合作、建立战略联盟、以对方为主的合作模式等合作方式上的实践特点。第四,以美国签证风波、日本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网络孔子学院的国际化架设为例,分析孔子学院在环境评估、目标制定与战略制定等政策规划方面的实践特点。

第6章 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优势、挑战与展望。首先,本章在以上五章论述的基础上,围绕国际理解教育“国际”与“理解教育”两个维度,分析了孔子学院所具有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关注组织管理的影响、差异化发展、倚重数字教育、推动公民教育等“国际”优势与理解语言、理解文化、兼顾知识与素养教育等“理解教育”优势。其次,本章分析了孔子学院在实践国际理解教育过程中遇到的来自国际理解教育、孔子学院、合作模式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最后,在总结前文论证与分析的基础上,从强化目标的导向作用、加强实践功能、跟进评估建设与肯定实践价值等四个角度展望孔子学院的未来发展。

第7章 结语。对本书的研究历程与结论进行回顾与总结,指出本书的创新与不足,探讨后续研究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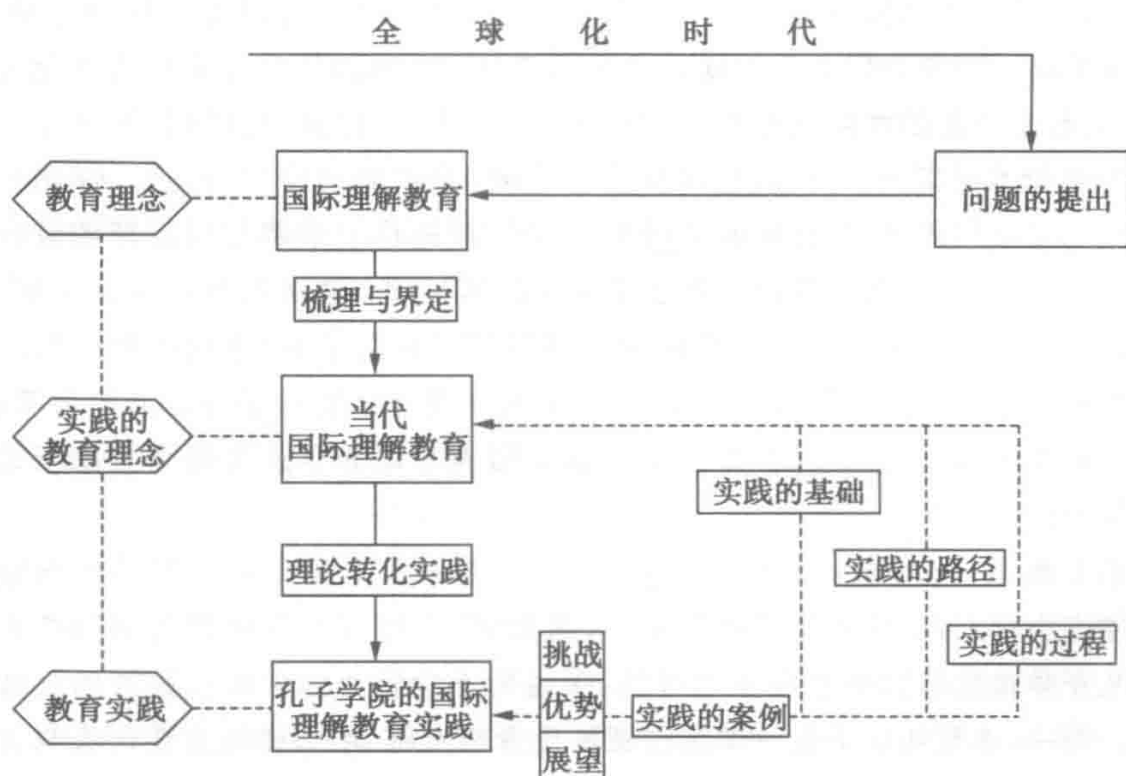


图1 本书主要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

# 目 录

<b>第 1 章 孔子学院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研究概述</b> .....	(1)
1.1 问题的提出 .....	(1)
1.2 文献综述 .....	(7)
1.3 研究理论与方法 .....	(22)
<b>第 2 章 国际理解教育的当代界定</b> .....	(32)
2.1 国际理解教育的相关梳理 .....	(32)
2.2 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与反思 .....	(43)
2.3 国际理解教育的当代内涵 .....	(57)
2.4 国际理解教育的当代意义 .....	(64)
<b>第 3 章 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条件</b> .....	(73)
3.1 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基础 .....	(73)
3.2 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途径 .....	(82)
<b>第 4 章 孔子学院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机制</b> .....	(105)
4.1 孔子学院作为教育组织的国际属性 .....	(105)
4.2 孔子学院教育理念的价值共识 .....	(118)
4.3 孔子学院教育实践的理解导向 .....	(126)
<b>第 5 章 孔子学院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案例分析</b> .....	(137)
5.1 对具体教学的教育实践 .....	(137)
5.2 对运营模式的教育实践 .....	(145)

5.3	对合作方式的教育实践 .....	(150)
5.4	对政策规划的教育实践 .....	(157)
<b>第6章</b>	<b>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优势、挑战与展望 .....</b>	<b>(163)</b>
6.1	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国际”优势 .....	(164)
6.2	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解教育”优势 .....	(171)
6.3	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挑战 .....	(180)
6.4	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展望 .....	(188)
<b>第7章</b>	<b>结 语 .....</b>	<b>(195)</b>
7.1	回顾与总结 .....	(195)
7.2	后续研究方向 .....	(199)
	<b>主要参考文献 .....</b>	<b>(201)</b>

# 第1章 孔子学院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研究概述

从理念通向现实的路究竟有多远？似乎很难有一个确切答案，因为通向现实的路远不止一条，而无论哪条路，可能注定都不会平坦。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正是从一种理念走向多种实践的过程。孔子学院作为其中的一种实践路径，历经十余年高速发展，有其时代背景、社会需要、研究推进等多重因素的驱动。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缘起

如果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的表现形式还多以经济全球化为主，那么70年代至今，“全球化”已经从经济领域扩散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包罗万象的理念与实践集合。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前所未有地压缩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国际化的移民潮此起彼伏，诸多服饰、饮食、娱乐及体育等文化现象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成为全球潮流，来自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跨界跨地域交流日渐频繁，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也随之出现。人类身处同一命运共同体的局面已然形成。<sup>①</sup>

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是促使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根本原因，这股寻求整体化发展的力量既给不少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加重了经济问题的破坏力。原来只存在于某些地区的经济问题，如今可能已经演化为一种全球性问题，迅速扩张的经济网络暴露出全球经济监管、协调机制的滞后，而大国之间的博弈，成为规划全球经济监管布局的决定性因素。美国、欧盟与全球新兴市场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各占据一方势力，但由于三者彼此间的利益取向不同，导致经济上的矛盾与

---

<sup>①</sup> 参见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年第4期。

冲突层出不穷,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又矛盾重重的经济发展局面成为全球各国政府面对的常态。在这种全球危机迭起、不同文明之间碰撞与冲突不断的时代背景下,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极右翼势力也逐渐抬头,整个世界在融合与分裂的碰撞中被不断撕扯,与“和谐世界”这一发展目标也是若即若离。

自人类现代传播变革伊始,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信息技术革命生生不息。依托于互联网这一全球最大的信息网络,数字技术与新媒体快速崛起,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多向性、交互性、共享性空前突出,人类的生活情境由地域性向全球性、时空关系由单一维度向多维度转变,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逐渐成为人类生活的日常组成部分。大数据、机器学习、计算机仿真等数字技术带来媒介的空前融合,为人类实现超越语言与文化隔阂的新沟通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平台支持。在信息载体前所未有地简约化与集成化的同时,人类的精神世界也正在被无限膨胀的信息熵不断压缩。与此同时,受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技术资源分配的不平衡等因素影响,“数字鸿沟”的存在感正在不断凸显;“数字鸿沟”并不仅仅存在于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放眼世界,这种由于数字技术分布不均衡导致的差距更是随处可见,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正如英国学者安吉拉·克拉克(Angela Crack)所说,媒介的发展正在破除时空的限制性力量,全球化的信息传播重新界定了全球和地方的物理界限,但传播权利并没有因为传媒技术的进步而发生根本性改变,重建国际信息新秩序成为新时期国家与民族的普遍认同,传统意义上的“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他人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很难避免,因此人类社会需要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对立的思维定式。<sup>①</sup>

技术的飞速发展带动科学主义思维的抬头,人类也开始思索,对科技的依赖是否可以人类带来没有烦恼的美好新生活?事实可能远没有想象得这么简单,已故物理学家霍金就曾警告人工智能不能替代人类情感与理性兼备的思考,完全人工智能化的实现将导致人类的终结。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空前依赖科技发展的社会,而这也将会是一个空前需要人文情怀与人文精神指引和关照的时代。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依靠四通八达的人际网络与交通网络,病毒在极短的时间内扩散至200个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新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疫情,引发了全球恐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新冠肺炎已经在全球层面“稳固传播”,其影响可能“持续数十年”。不得不承认,这场疫情在给经济带来重创的同时,也给国际秩序和全球化进程的走向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恐怖主义是严重威胁当下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9·11”发生后十多年间,

---

<sup>①</sup> 参见[英]安吉拉·克拉克:《全球传播与跨国公共空间》,金然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挪威爆炸袭击案、韩国火车站连环爆炸案、美国校园枪击案等恐怖袭击事件接连爆发,大量平民受到伤害。近年来,此类事件在中国也时有发生,让人们切身感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恐怖主义日益猖獗的背后,折射的是失落的个人或群体,因为得不到理解或缺乏表达的机会,生活或者思想步入某种绝境而采取极端行为的深刻社会问题。我们甚至看到,近年来发生在西方的恐怖袭击事件中,有不少恐怖主义分子出身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很多甚至留学西方或者出生在西方,由于缺少发展出路与机会而产生了挫败感,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全球化带来的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冲击与难以平衡的张力作用的结果,也揭示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具有先天的缺陷,关注人类文化心灵与理解的教育亟待被重视。

全球化、反全球化及其问题,不仅重构了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与制度体系,也触动了学术界的神经。学者们的关注焦点出现两种集中趋向:一是围绕西方中心话语,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学术话语与权力开始向强势的语言与文化方向倾斜。二是由民族主义继而发展出“后殖民敏感性”,强调对西方学说坚决抵制。无论是哪一种趋向,其本质都是没有建立起对自身民族文化与身份的自信,没有形成当代世界文化的主体参与意识<sup>①</sup>,对自我的认识不清也会导致对他者的认知迷茫甚至是盲从与否定,因此亦有不少学者提出要警惕一切“某某中心主义”的研究取向,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保持对自我与他者清醒而深刻的认知尤为重要。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就“文明的冲突”在当前社会的变化说,如果在20世纪和冷战时期理解意识形态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那么在当前情势下,意识形态已经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人们不再认同意识形态,而是转向认同文化。<sup>②</sup>文化在当代社会成为理解文化差异、进行国际对话的核心要素。在全球化对民族认同构成强烈冲突、信息传播空前迅捷、传播影响力随新技术的应用呈指数级扩散的今天,单纯诉诸情感并不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和平,公平思考与理性判断、理解与包容的价值取向应成为人类社会实现和平发展的基本着眼点。帕里克(B. Parekh)提出非种族的普遍性人类常量,作为“模糊但无误的全球道德共同体观念”,这些常量包括人类的团结、价值、福利、基本利益、平等与公平、尊严等<sup>③</sup>,这些价值观念基于人类共同利益提出,并得到诸多国家的响应,也成为我们探讨人类对话的一个出发点。

费孝通先生针对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指出,当前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种族间,因为全球化导致相互接触变得越来越频繁、复杂,各种矛盾冲突不断出现,但

① 参见王岳川:《发现东方》(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54页。

② 参见哈佛燕京学社主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③ B. Parekh, *Non-ethnocentric universalism, Human rights in glob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8-159.

整个 20 世纪似乎都没有找到一条理想的路径来解决这一问题。费孝通先生提出设想,或许可以从人的思想和意识入手,进行积极的和平共处教育,在精神文化领域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与共存的教育体系。<sup>①</sup> 但这套体系究竟该怎样设计,费老并没有给出详细解答。所幸的是,这样一个教育体系早在 1946 年就已经被提出,并被冠以“国际理解教育”的名称,历经多年的发展与完善,也曾经在 20 世纪中期世界很多国家形成规模化的实践运动。进入全球化新时期,国际理解教育迸发出更大的能量,因而探讨与实践这一理念,不仅对教育领域自身而言发展意义重大,对全球化时代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样影响深远。

孔子学院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发展壮大,或许可以这样看,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全球问题爆发与多元文化认同和理解危机的双重夹击下,中国提出的一种问题解决之道。

孔子学院最早是作为语言推广机构出现的,教育实践是其履行使命的核心途径。语言推广是维护人类文化多样化的共同责任,同时又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公共活动、提升文化软实力、参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孔子学院诞生之前,包括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在内的世界主要语言推广机构已经存在并发展了一段时间,并积累了一定的语言推广经验。2002 年,在借鉴世界其他语言推广机构的筹建与发展经验基础上,教育部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开始筹划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2004 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揭牌。

时至今日,孔子学院已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语言推广机构。截至 2019 年 6 月,已经在全球 155 个国家(地区)设立了 530 所孔子学院和 1129 个孔子课堂。其中,亚洲 35 国(地区),孔子学院 126 所,孔子课堂 112 个;非洲 44 国,孔子学院 59 所,孔子课堂 41 个;欧洲 43 国(地区),孔子学院 184 所,孔子课堂 322 个;美洲 26 国,孔子学院 141 所,孔子课堂 559 个;大洋洲 7 国,孔子学院 20 所,孔子课堂 95 个。<sup>②</sup>

从组织发展的理论视角看,孔子学院目前已经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巩固实力与提升质量成为组织发展的重点,同时注册学员、教师与志愿者、教育资源与教材开发、国际交流活动等相关方面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孔子学院也由最初的语言推广机构,成长为在当今社会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文化交流平台。

孔子学院的人员构成包括注册学员及潜在学习者,孔子学院教师、志愿者及专家学者,参与建设孔子学院的中外大中小学、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监事会及专业

<sup>①</sup> 参见费孝通著,刘豪兴编:《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81 页。

<sup>②</sup> 参见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关于孔子学院/课堂》,2019 年 8 月 1 日,[https://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https://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委员会等管理机构,教育机构、社会组织或商业机构、社区等其他支持孔子学院建设的组织或个体。在组织结构上,管理机构为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sup>①</sup>,负责整个组织的课程设置功能与组织管理功能的实现;在建设方式上采取中外方合作的形式,共同开展包括市场营销、人员管理、跨国合作、语言教育与交流、管理战略制定与落实及组织管理等工作(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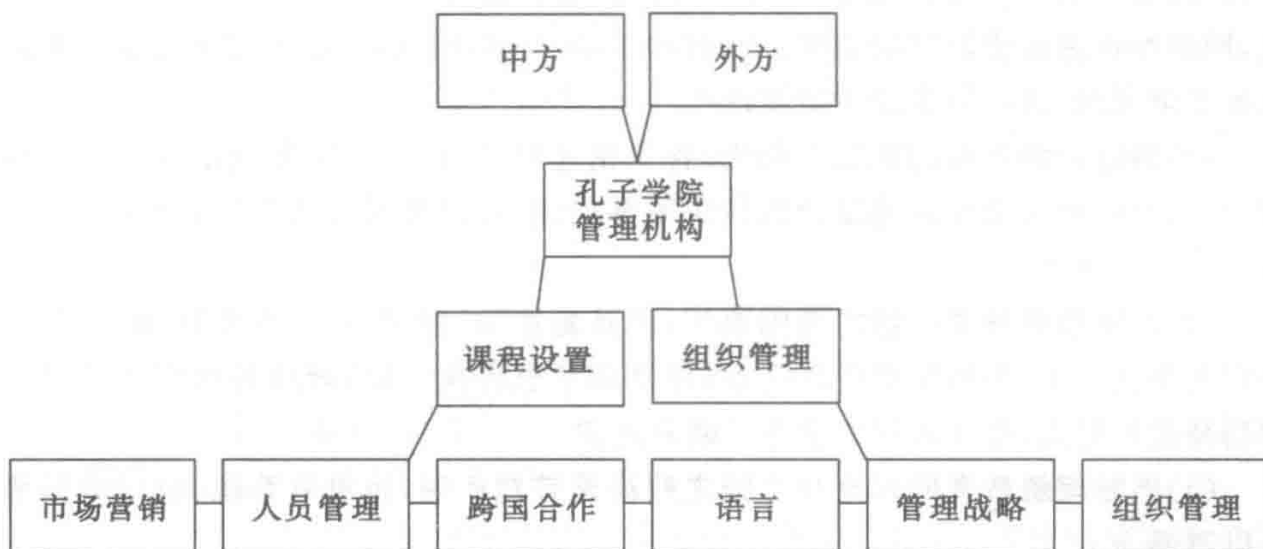


图 1-1 孔子学院的基本组织结构

孔子学院基于语言与文化的教育实践,是尝试通过教育手段弥合“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与不解”的一种探索,是追求理想传播效果的一种不断建构和调试的过程,无论从教育行动还是从社会发展看,意义都是重大而深远的。然而,长期以来有关孔子学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语言教学、语言学与跨文化交际等领域,虽然近年来有关孔子学院的全球发展与组织管理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是整体研究现状呈现缺乏系统性理论指导、研究视野较为局限、研究成果分散且匮乏等问题,且从国际理解教育的视角探讨孔子学院实践的研究尚不多见。因而,本书尝试进入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视野中,据此分析孔子学院的实践活动,从而思索国际理解教育在当代社会的重要价值,并为孔子学院的研究和实践带来新的思考。

### 1.1.2 研究问题

作为一个著名的教育理念,国际理解教育在 1946 年即被提出,最初是一种旨在“理解国际重大问题、尊重联合国和国际关系、消除国际冲突的根源、发展对他国

<sup>①</sup> 2020 年 6 月 18 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孔子学院总部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通知》,将孔子学院总部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不再对外使用“国家汉办(英文 HANBAN)”名称。鉴于本书稿完成于更名通知发布之前,且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因此,为保证表述的确切性,对文中部分“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名称未予修改。

的友好印象”的教育理念,其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次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框架进行补充,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出于各种考虑也纷纷投入实践,并取得了不同的效果。但直到今天,有关国家理解教育的定义论述依然宽泛且模糊。

首先,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涵盖面很广、关注的问题很多、牵涉的学科类型多样,因而某个单一学科的理论很难担纲其理论基础,需要进行跨学科的参照与界定,同时存在着价值取向的问题。因而,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模糊界定也使这一理念充满了争议性,这种争议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国际理解教育的界定不明晰,含义论述过于空泛,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范式,导致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的认识不够精确,理论体系庞杂散乱,削弱了这一理念的理论价值。

(2)国际理解教育牵涉的范围很广,尤其是在20世纪50~70年代前后,各国的实践案例较多,分析显得杂乱无章,评价标准也各执一词,导致各国实践的方式与路径差异较大,也在过程中遭遇了诸多问题。

(3)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缺乏转化机制,也没有系统、稳定的框架可以遵循。

很多学者尝试从国际理解教育这一理念出发进行新的阐述,并对上述争论中提到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与分析,发展出包括国际教育、全球教育、人权教育等教育理念,这些理念或者说法大多是国际理解教育的衍生品,其影响力和知名度却一度超越了国际理解教育,这一现象值得反思。

其次,因为界定不明确从而导致在实践的过程中缺乏理论依据和评价机制,致使很多由各国政府或者教育组织发起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项目最后不了了之,使成果付诸东流。针对这一现象,本书需要重新梳理近一个世纪来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发展,并根据当代社会特点和要求重新界定其含义,可为本书接下来的研究提供几方面帮助:(1)清晰认识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历程,以理论发展历程与实践需求为基础对其进行界定,挖掘其在当代社会的重要价值。(2)为研究孔子学院的教育实践提供尽可能稳定和清晰的理论框架。(3)梳理和分析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路径、具体表现、挑战与未来发展等问题,为当代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路径及孔子学院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并非所有的教育理论都能直接运用于实践,但教育理论应该是指向实践或者以实践为出发点的。如果不能在教育实践中得到检验,那么教育理论的价值也将遭受质疑。理论上的启蒙、扩散、批判思考与检视,能激励教育实践主体反思教育问题,唤起其主体参与意识及对其身份价值的认同感,促使实践主体深入思考教育中深藏的有关人性、心灵、价值等问题,在教育实践中寻找研究问题、建构理论、判

断理论价值、探究教育的意义等<sup>①</sup>，是让教育理论走入实践的重要过程。国际理解教育作为一种立足于现实，并指向现实需要的教育理论，需要通过系统实践以彰显与检验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对孔子学院而言，历经十余年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一个寻求语言与文化理解的国际教育组织，孔子学院的很多实践特征与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有契合点，而缺乏理论指导、研究成果匮乏的现状一直以来也是孔子学院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广被诟病的问题。本书尝试从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体系中寻找孔子学院可以学习和借鉴的部分，从教育学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孔子学院通过语言与文化传播的手段达成国际理解、促进世界和平的过程，为孔子学院的发展提供一种理论依据，同时丰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这些都是本书的研究意义所在。

将国际理解教育作为本书的立论基础，是因为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与孔子学院研究彼此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理论与实践的互补。在探索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问题时，两者之间的目的、性质、方式与机制是四个核心问题<sup>②</sup>，本书研究的实质即围绕这四个核心问题展开，力图回答以下问题：

- (1) 新时代背景下，国际理解教育的学术与社会意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2) 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条件与路径是什么？
- (3) 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机制与具体表现是什么？
- (4) 孔子学院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的优势、挑战与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际理解教育的文献综述

我国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以 CNKI 来源期刊作为资料检索内容，可查证的最早文献是 1974 年发表于《日本教育情况》（即现在的《外国教育研究》）上的日本学者榊原康男的《国际理解教育的新方向》，这一年与国际理解教育相关的文献共有 7 篇，呈现一种小规模集中喷发的状态。这种情况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都没有再度出现。因为 197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为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

---

<sup>①</sup> 参见王彦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再思考》，《教育发展研究》2010 年第 4 期。

<sup>②</sup> 参见李政涛：《交互生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转化之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4 页。

的教育及与人权和基本自由相联系的教育之建议》<sup>①</sup>，进一步深入解释了国际理解教育，认为其教育目标不只是寻求主权国家间的理解和合作，而且还需要使人们意识到，世界各国在人口、资源、能源、环境、教育等问题上彼此高度依赖，作为全球共同体和寻求共存共荣的精神应该被广泛传播。因此，1974 年对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的重要意义，也使得研究具有了更多可以深入的可能。1985 年，国内学者崔录发表《资本主义世界道德教育状况和趋势》一文，是可查证的国内学者最早阐述国际理解教育的文章。1994 年，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讨论再次出现一个小高潮，这与当年在苏州召开的国际教育学研究大会直接相关。在此次会议上，顾明远等学者对国际理解教育在 21 世纪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sup>②</sup> 应该说，2000 年之前国内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受到来自日本教育政策的巨大影响，主要研究内容也大多与日本的相关教育思想与政策动向直接相关。进入 2000 年之后，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文献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且国际理解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研究命题，逐渐从对“教育国际化”这一主流命题的附属转向日渐清晰的独立命题，并且，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也逐渐深化，其研究主题日趋多样化，涉及教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自 1979 年 1 月 1 日到 2019 年 8 月 1 日，以“国际理解教育”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在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共检索到 804 条文献记录(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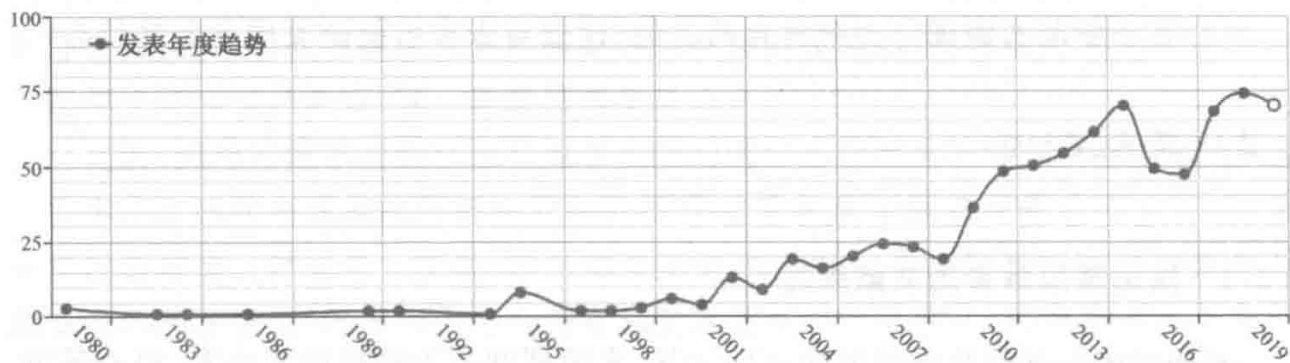


图 1-2 1979~2019 年知网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论文数量变化

国内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第一，在全球化语境下，阐述国际理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纵横向分析其历史、政治、教育及社会意义。崔录将国际理解教育定义为一种道德教育，认为与人权教育、和平教育密不可

<sup>①</sup> UNESCO,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Co-operation and Peace and Education Relating to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1974, <https://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40/114040e.pdf#page=144>.

<sup>②</sup> 参见朱永新：《迈向 21 世纪的国际理解教育——国际教育学研究大会苏州会议纪要》，《比较教育研究》1994 年第 3 期。